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梁景和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梁景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梁景和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097-7886-9

I. ①第… II. ①梁… III. ①中华文化—文化史—近现代—国
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7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524 号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 梁景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886-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梁景和 / 1
“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中的移民心态与策略	周积明 / 19
简论劳动史研究的新视角	
——以汉冶萍档案研究为例	郭 莹 / 24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教育的转型与困境（1912~1937）	朱汉国 / 27
试论国民党政权下选拔陆军大学学员制度	〔日〕细井和彦 / 47
北洋时期基层司法经费的来源、支取与分配	唐仕春 / 70
被恢复与被改造的传统	
——1940年代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村庙会	韩晓莉 / 86
追求大历史与个体生命的融合	
——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探析	李慧波 / 103
民国时期留日女学生的留学生活	
——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例	〔日〕杉本史子 / 120
气枪与娃娃：民国时期玩具文化中的性别议题	张 弛 / 132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婚姻的“五宗罪”	王栋亮 / 170
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	
（1941~1949）	江 沛 王 微 / 185
共和国初期的性教育（1949~1966）	廖熹晨 / 205
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性恋生存境况变迁研究（1979~2001）	
.....	董怀良 / 219
从北京妙峰山看晚清礼俗教化的变迁	李俊领 / 240

近代旧产婆由取缔到改良的转变历程述论	朱梅光 / 262
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展览会研究	李洪河 / 275
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武 婵 / 291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梁景和*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希冀把生活质量作为其研究的一个新维度，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理念之一。为什么要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主要研究哪些内容和问题，怎样进行研究，这是本文拟探索的主旨。

一 概念与价值

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把生活质量作为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医学等学科也开始探讨生活质量问题，但至今为止历史学对此却鲜有研究。如果从史学角度来研究生活质量，可以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所谓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客观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幸福感受程度。^② 这里既包含客观生活质量，即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也包含主观生活质量，即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研究生活质量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肯定和确立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的目的和欲求，是人类整体生活和人类个体生活的目的和欲求。生活质量既反映在社会生活条件方面，也反映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上，幸福感是人类生活永恒美好的追求，正如休谟所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

*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①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 1958 年在《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活质量”这一学术概念。

② 这个概念界定虽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没有本质的差异，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则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于获得幸福。”^①“对幸福生活之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是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共同欲求。从这一意义上说，幸福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理想。”^② 研究生活质量的意義和价值还在于要探寻生活质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概念或界定；设计并确定生活质量这一崭新学术研究领域在不同时代的基本框架体系；探讨不同时代不同需求层次的人^③对生活质量认识、理解和判断的合理性、差异性和谬误性及其造成此种现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等的基本缘由；研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功能的基本根据；探求不同时期人类个体主观生活质量复杂性形成的基本原因；探索不同时代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表现出的层次相同以及“处于相同物质生活水平的人们，对其自身生活的评价和满意度可以大相径庭；反之，生活满意度相同的人，其实际物质生活水平可以相距甚远”^④的基本因由；研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两者间内在的基本逻辑；等等。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了解了生活质量的研究概念和研究价值之后，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它的学术承续。从宏观史学发展脉络看，历史学早期从关注“事件的历史”出发，主要是探讨政治的历史，研究政治军事和政权更迭的所谓大的历史事件；次之开始进一步关注社会的历史，主要探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历史状态；渐次又进一步关注历史主体的内在观念和心理的历史，去研讨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感受。从西方兰克以前的政治史，到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再到后来的观念心态史、新文化史以及从中国的王朝史、清末的新史学，再到后来的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大致基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学术历程。历史科学发展的这种脉络的客观性，是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就如中国的王朝史，它主要是在王朝时代为王朝的统治需要服务的；西方的新社会史也是为有益于民众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改观服务的；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服务

① 《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杨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81页。

② 王璐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3日。

③ 按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友爱与归属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④ 冯立天主编《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第107页。

的。而今天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生活质量是中国当下社会注重群体与个体的生存状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增强主观幸福感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学术发展脉络承续的客观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二 内容与问题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它的研究内容，有初期起步与未来发展这一过程的前后变化，所以应当遵循先窄后宽、先易后难、先分解后综合的几个原则来进行。

首先，我们应当关注人类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刚刚开始从生活质量的领域来研究社会文化史时，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从庞博的社会生活中先选择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来着手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广太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会不断地添加新的内容。然而社会生活无论怎样庞杂多样，其中贯穿人类社会过往时代的基本范畴却是几种相对恒常的具体内容，那就是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两性伦理、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这些基本的内容和范畴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主题。^① 这些最为基本的生活内容贯穿于长时段的历史阶段中，它们的现状以及发展变化恰恰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所以研究生活质量首先可以从人类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即从这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范畴做起。虽然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我们仅用上面的几句话就概括了，但它的具体内容还是相当的广博，所以我们研究的内容就不可能是单一狭隘的。比如衣食住行中的“食”就可以涵括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括食品原料、食品生产、饮食器具、饮食风尚、菜系品种、饮食思想、美食养生、食疗保健、茶酒饮料等；再如家庭一项就可涵括着家庭形式、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文化、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类别、个体家庭等；再比如生老病死中的“生”也涵括着极其宽广的内容，包括人生仪礼、教育成长、强身健体、求职就业、养家糊口、日常消费、友情社交、理想追求等。以上所举，说明仅是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就有着无限丰富的研究内容，从中选取任何一项，都可以把它作为生

^① 参见梁景和、王峥《中国近代早期国人眼中的欧美生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活质量研究的一个起点。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以往有着丰厚的研究，如果转换一下视角，运用生活质量的维度再去思考这一主题，可能会发现很多有学术价值的新问题。

其次，我们研究的内容再向前伸展，可能会显得更为开阔和宏观，即我们也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宏大的范畴去探索生活质量问题。诸如各个层次的政治管理、中央和地方的机构组织、军队、法律、监狱，这些政治因素的实施和运行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诸如不同的经济制度、政策和经济措施、手段，不同的经济行政权力，生产力水平，中外贸易的发展，各类企业的发展壮大无疑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诸如文化教育政策的发展变迁，社会信仰和社会思潮的变革，民族国家所宣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诸如社会城乡的管理和调控，社会的保障和疏导，市政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无疑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诸如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及其美化和治理，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的生活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综上所述，即便我们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作为视角同样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诸如历代国家统治集团面对天灾、人祸、瘟疫所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救济，与民众的生活现实与生活质量紧密相连；明清以来苏州的碑刻^①中有关于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管理、市政管理的碑文，这些社会管理的功效，与民众的生活现实与生活质量紧密相连。革命家王稼祥曾给他的堂弟王柳华写信说：“可怜我们受环境的压迫，婚姻不得自由，求学不得自由，择业不得自由，而且一盼前途，就觉茫茫毫无把握，不知自己的生活怎样才可解决。唉！这样的环境，难道不能或不应当把他打碎吗？不过这不是局部问题，乃是政治问题，政治改良，环境自不求自善。柳华，‘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应当负改革中国政治的责。”^②从这样一份家书中，

① 参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第10~11页。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革命，改革政治，同样也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紧密相连。当然，这样研究的范畴与上述第一点不同，它更显开阔性和宏观性。

最后，我们可以对生活质量涉及的诸多内容进行一种综合全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复杂研究，即便如此，这样的研究同样可以对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生活质量的优劣高低做出基本的梳理、判断和评价，这就是进行这种复杂研究的价值所在。

上面研究内容所设置的三个梯度，只不过是研究生活质量初始阶段的一个一般性原则，按照这样的一个梯度，有助于我们研究的起步，但这并非绝对呆板硬性的研究秩序，根据研究队伍的状况以及研究者的兴趣、积累和能力，完全可以打破这样的原则秩序，提倡研究内容的宽窄、难易、分解综合的交叉、互动和提升。

那么，我们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内容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思考研究生活质量的问题意识，能否做出这样的判断，研究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理解；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物质发展以及特定时代生活质量的标准认同；探究特定历史阶段特定人群具体生活的实际状况以及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实际状态；研讨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人群会去追求那样的生活质量，会去那样的生活，会有那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向往，这一切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等因素”^①决定的。只要对上述的问题意识有了诠释和回答，我们的研究才能彰显它的应有价值。

三 研究的方法

研究生活质量所采用的方法随其研究具体内容不同以及问题意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随着研究的展开和不断发展，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的积累，还会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目前，我们首先可以关注如下一些研究方法。

^① 王露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1月13日。

(1) 宏观微观的研究方法。关于生活质量,既可以宏观研究,又可以微观研究。^①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时间、空间、人群等相关概念。诸如既可以研究一个长时段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短时期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大区域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小区域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多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单一群体或个体的生活质量。关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个体、不同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有助于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细化和具体化。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史料能够开启我们的思考,比如在地方志中有记载浙江人订婚习俗的,反映了浙江人富贵与平常之家的不同生活:“订婚之始,谓之缠红。丰厚之家,聘物恒用金饰,如手镯如意耳环戒指之类,加以绒线制成五色盆景,光艳夺目。满盛盘中,谓之花果缠红。平常人家,则无如是之财力,或用小纹银一锭,鑲金如意一事,取一定如意之意,或用鑲金八吉一对,镀金手镯一副,取有吉局之意。”^② 民国时期河南安阳的衣着习俗,可见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境内习尚,认俭朴为美德,以装饰为浮夸。除资产阶级、官僚家庭以洋布为衣料,间或着绫罗锦缎外,余则均以自织之棉布加以颜色裁为衣裳,一袭成就,间季浣濯,直至破烂而后已。”^③ 民国时期河北元氏县士商与农民使用着不同的交通工具,“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故自行车之销路,有一日千里之势。惟农民出门,多步行”。^④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以乘汽车为豪,每至礼拜日,必有许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车,疾驰于南京路、静安寺路、福州路”。^⑤ 这些地方志资料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我们再看民间歌谣中的史料,如反映明末农民苦难生活的歌谣:“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壮者抗,弱者死,朝廷加

① 宏观和微观都是相对概念,宏观是相对微观而言,微观是相对宏观而言,所以这里舍弃了中观的概念。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浙江·海宁风俗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27页。

③ 丁士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第102页。

④ 丁士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第127页。

⑤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风俗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139页。

派犹不止。”^①民国时期有反映农民怨苛税的歌谣：“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②如反映官僚权贵享乐富贵的生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③“出外做官，回家享福”“千里做官，为的吃穿”^④，这些也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清末竹枝词也是如此，带有宏观普遍性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的记载，如富家女子从南京去上海的情景：“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遨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⑤市民流行穿西装的情景：“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工厂匠人争选买，为他装束便摩挲。”^⑥此外，丰富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戏曲、诗词等，也能为我们提供从宏观视角研究生活质量的珍贵资料。以小说为例，陈寅恪认为，小说可以证史，小说虽“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⑦。这通性之真实就是宏观之真实。^⑧如傅桂禄编辑的三卷本小说《中国蛮婚陋俗名作选粹》就是很好的例证，三卷本《商人妇》、《活鬼》和《节妇》所收集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典妻当妻、童养婚、人鬼恋、冥婚、老夫少妻等一幕幕的人间悲剧，是“旧中国蛮陋婚俗的缩影与概括”^⑨，反映了一部分人群的婚姻生活质量。通过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小说是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通性之真实”的。综上所述，说明运用大量的史料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那么从微观的角度同样如此。这在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文献中就蕴藏着大量丰富的材料，例如《历代日记丛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五百多种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年间的日

①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74页。

②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844页。

③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855页。

④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859页。

⑤ 朱文炳：《海上竹枝词》，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03页。

⑥ 顾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167页。

⑦ 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第157页。

⑧ 齐世荣先生有专文论述小说的史料价值，《谈小说的史料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⑨ 参见傅桂禄编《商人妇》《活鬼》《节妇》的内容简介，群众出版社，1994。

记进行的影印集成,这其中不乏对生活质量进行微观研究的珍贵资料。诸如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对“家常琐事,柴米油盐,无不一一记载”,^①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提及他的老师李叔同曾经说过:“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②李叔同的这段话,为我们研究他个人一生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成为国家的领袖,他的一些亲朋故友要来京见他,并希望解决工作或生活上的问题。处理这类亲情方面的事情,毛泽东有诸多难处。毛泽东在给亲属的信中,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和抚慰工作,并要求亲友“不要来京”,或寄钱暂时解决一下亲友的生活困难^③,从这些书信里能够感觉到毛泽东当年的心理感受。

(2) 综合分解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活质量,既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分开进行分解研究。综合研究既关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的互动和影响,也关注影响生活质量的诸多因素,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比如当代社会“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程度很低,社会秩序恶化,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所以,生活质量不仅表现在生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物质、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④比如清代具体的饮食生活,宫廷、贵族、民间的饮食生活中的风尚、饮食品种、品种质量、饮食器具以及饮食的养生思想是不同的,这种具体的饮食物质生活与饮食观念和饮食诉求的多方面综合才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总体性的饮食生活质量。^⑤再如民国时期的居住生活,官僚权贵们居住的高级官邸、富商们居住的豪华别墅、

① 王锺翰:《〈历代日记丛钞〉序》,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

② 丰子恺:《法味》,杨耀文选编《文化名家谈佛录——一日佛门》,京华出版社,2005,第49页。

③ 参见毛泽东给杨开智、文南松、毛泽连、毛远梯、毛宇居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

④ 王海敏、陈钰芬:《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8期。

⑤ 参阅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卷五,华夏出版社,1999。

中产阶级居住的单元公寓、穷苦贫民居住的棚户区和茅草屋，这些物质的居住条件与居住者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观念与生活目标要求的结合，构成各类人等的综合性居住生活质量。譬如中国末代的皇后和皇妃们，她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但是她们悲惨的精神生活和婚姻生活，能说她们人生的生活质量高吗，显然不能。溥仪说，“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象文秀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①这段话道出了婉容一生的悲惨生活。可见优裕的物质生活未必一定会生活幸福。而分解研究既包括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包括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两种研究是分别进行的。其中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条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的大范畴和大背景在具体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教育、就业、娱乐、医疗、健康、保险、养老等诸多方面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什么，它反映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诸如近代国人的娱乐生活，各类人等如何看戏剧电影，如何听书阅报，如何游乐购物，如何去酒馆茶馆，如何琴棋书画，如何跳舞打牌，如何进行体育活动，如何交往游历，这都能对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做出探索和评价。再比如近代以来交通工具的变迁，从传统的轿子到人力车、畜力车、西洋马车、自行车、机动车、火车、轮船、飞机等，近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变化，同样也可以观察到各类群体客观生活质量的改善或提高。从餐饮地点也可看出不同人等的饮食生活质量，近代上海，“在饭摊、露天食堂、饭店楼下就餐的多是工人、黄包车夫、苦力等”^②，而“只有穿长衫的人才上楼吃”^③。的确，在哪儿吃，“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④。晚清民国上海闸北棚户区居民的住宿是茅草棚，“以污泥为墙，稻草为顶。而一行一行排列的距离，又极狭窄，普通不满两公尺，所以常常有一经着火，瞬息延烧千百余户的！在他们每一家的住宅里；都只有一进门就是外房也是工房的食喝于斯生死于斯的一大间，父母子媳六七口住在一个处所，喂水烧饭

①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末代皇后和皇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第2页。

② 唐艳香、褚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第200页。

③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79页。

④ [法]图珊·萨玛：《布尔乔亚饮食史》，管筱明译，花城出版社，2007，第15页。

也在这一个地方，有时还得划出一小块地方来养猪，而他们的大小便也就在这喂猪的棚里了”^①，这类人群悲惨的居住生活，一目了然。相反，梁实秋在上海和青岛做教授时的物质生活质量是很好的，“那时当教授收入较高，实秋兼职又多，所以家庭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中产阶级了”。^② 1928年梁实秋在上海从“爱文义路的一楼一底中迁出，移居赫德路安庆坊，是二楼二底，宽绰了一倍”。1929年“又搬到爱多亚路1014弄，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而且处于弄堂深处，非常清静”。梁实秋很喜欢青岛，1930年又到青岛大学任教授，他在“鱼山路4号租到一栋房子，楼上四间楼下四间。那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③ 可见梁实秋那些年优裕的居住生活条件。而主观生活质量则注重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种心灵的感受更显至关重要，无论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内心的生活价值观左右着个体的主观生活感受，诸如有人崇尚“金钱未为贵，安乐值钱多”“贫穷自在，富贵多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人生理念，那么不管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因为他有着知足常乐的心态，所以他的主观感受或曰他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不与他的客观生活条件成正比了。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④ 这与民间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相似的意蕴，是对主观生活感受的辩证态度。快乐幸福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它有相对的独立性。甚至面对病魔和灾难，人们都可以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所以钱锺书又说：“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⑤ 而主观幸福感尤其与婚姻恋爱关系密切，由于与有真爱的恋人结婚而感到幸福，而与没有真爱的人结婚或与有真爱的恋人不能结婚都会给人带来内心极度的痛苦。林语堂曾经热恋一位至交的妹妹C，C生得其美无比，因C的父亲在一个名望之家为C物色了

① 陈问路：《大上海的劳工生活状况之透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第二十七期），工人出版社，1985，第130页。

② 鲁西奇：《梁实秋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第107页。

③ 鲁西奇：《梁实秋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第107~109页。

④ 钱锺书：《论快乐》，《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第20页。

⑤ 钱锺书：《论快乐》，《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三联书店，2002，第21~22页。

一名金龟婿，故林语堂与C的婚事无望，林语堂自述，“我知道不能娶C小姐时，真是痛苦万分。我回家时，面带凄苦状，姐姐们都明白。夜静更深，母亲手提灯笼到我屋里，问我心里有什么事如此难过。我立刻哭得瘫软下来，哭得好可怜”^①。人世间这样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

(3) 理论命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预设方法。所谓理论预设是指已经被社会 and 人们基本认可的理论，它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活实践有了切身的感受，进而对社会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观点。比如客观物质生活相同的人们，其中主观幸福感却是截然不同的；相反，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观察和感受到的生活真实，进而被总结、被概括、被提升，最终被人们所认同。而理论预设的研究方法是指，我们要依据这样的一些被公认的理论观点进行历史现象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来印证这些理论观点的客观实在性，故而用这种理论预设的方法也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清末民初剪辫子，客观事实相同，但给一些人带来了心情的兴奋和愉悦，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失落和痛苦；晚清以来，婚姻自由逐渐流行于社会，同是一个婚姻自由，给多少开放的年轻人带来了情感的愉悦和幸福，也给多少传统守旧的父母们带来了精神的创痛和苦楚；民国时期丧礼的改革，多少家庭因繁文缛节的革除而感到生活压力的减轻，也有多少人因不能接受新式丧礼观而痛楚不堪。如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就可以回答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相同的人们，而主观幸福感却是不同的这样的理论预设。相反，清末留美幼童，出国时穿一身华丽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帽，幼童们会感到那样的喜悦和快乐，而到了美国不久，他们改穿一身休闲服、又穿上运动鞋，他们仍然感到那样的洒脱和心怡，虽然内心的感受相同，但客观的装束已完全中西两异了。革命烈士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婚礼上的感受与很多夫妻在婚礼上的感受，应当说是有着某种共同之处的，虽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陈周面临的是死亡，而很多夫妻面临的是新的生活。类似的研究同样可以证明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条件和生活境遇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理论预设。其二是命题预设方法。所谓命

^① 《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70页。

题预设是指古往今来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真理性并让人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本质，甚或成为人们能够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路径和方法，这些概念还朗朗上口，便于传诵。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命题去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去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即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再去验证既往的命题，一方面给命题以历史的解释，同时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地域和历史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① 这一命题叙述了富贵人家门前飘出酒肉的味道，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说明了一个社会财富不均，贫富差距大，穷人缺少保障的社会现象，也是典型的研究社会生活质量的命题。还有“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② “欲求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等类似的命题，也能够进行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还有些命题，如“三年讨饭，不愿做官”^③、“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④ 以及民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命题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观念和追求的生活样式，并以此为生活乐事。曾国藩就希望自己的后代以耕读为要，不谋大官，他说“凡人都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⑤。由于曾国藩追求这种以读书为要的生活理念，他的后人大多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而少谋官位。梁启超也认为做官不如做学问，他本人晚年也弃官从学，对其后代亦如此要求。1916年他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谈及女婿周希哲做官一事，认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⑥ 1921年7月22日他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再做数年官，恐将经商会耽误，深为可惜。”^⑦ 正是由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生理念和家风，他教育的子女有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有考古学家梁思永，有图书馆专家梁思庄，有经济学家梁思达，有火箭专家梁思礼。^⑧ 但也有与之相反的生活理念和命题，以传统的“学而优则仕”

①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②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703页。

③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852页。

④ 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第657页。

⑤ 曾国藩：《字谕纪鸿儿》，张海雷等编译《曾国藩家书》上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第332页。

⑥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796页。

⑦ 同上书，第931页。

⑧ 参见丁宇、刘景云编著《梁启超教子满门俊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